

送書難

汪強



前天，幾位寫雜文的朋友談出雜文集。有人說，寫雜文不難，發表難。有人說，出雜文集不難，賣書難。出了書，賣不出去，那就只有送。送書難不難，好像沒有人說。

可能有人說：「這算什麼問題？把東西白白地送給人有什麼為難的？」是的，如果要求不高，只要書由自己手上送到別人手上就行，那送書是不難。把書運送到大街上，像發廣告似的將書塞到行人手中，保證一天能發數千本。但如果把標準放高點，送書就有一定的難度了。

我有一個最低標準：書送給人家，人家要看。假如有一個人恭恭敬敬地接過我的書，並說回去後一定認真拜讀，可下次遇上他時，他根本就不提那本書，你提，他馬上扯到其他話題上，十有八九他一篇文章都沒看。不難想到，他可能將它放在書架上永遠不看它，他可能將它跟舊報紙舊紙盒放在一起賣，他可能將它撕下來剪成什麼給孩子玩……不管怎麼樣，他反正沒有看過我的文章，在他的眼裏我的文章根本不值得一看，我心裏肯定不好受。可是，這能怪人家麼？不能，你送給人家，人家沒有拒絕，是夠禮貌的了。

書送給人家，多數人能翻開來看看，這個要求看似不高，真正做到卻不容易。首先，如今愛看書的人多不多？老實說不多。有人有時間打麻將，有時間玩撲克，有時間旅遊，特別是有時間用手機看微信，就是沒有時間看書。其次，在愛看書的人中，愛看雜文的人多不多？對此我同樣悲觀。一些人手不釋卷，很愛讀書的，不過，他們喜歡的是通俗小說，是心靈雞湯，是成功秘訣。至於雜文，愛看的人實在不多。假設所有的人中有十分之一愛看書，在愛看書的人中有十

分之一愛看雜文，也就是在十萬人中大約只有一千人愛看雜文，我沒有認真統計我到底認識多少人，但估計不超過一萬，因而要將自己的一千冊雜文集都送給愛看雜文的人，難度顯然很大。

說到送出去的書人家懶得看，有些作者就嘆息，說外國人怎樣愛看書，以此反襯我們有許多同胞不愛讀書，進而說到人心，說到人心浮躁。人心浮躁的現象是有的，將《紅樓夢》說成最不受歡迎的古典小說，因為學生「怕周樹人」而將一些魯迅作品趕出中學教材，都是浮躁的表現。然而，不僅讀者會浮躁，作者也會浮躁，浮躁的表現之一是盲目求快，不講究品質。有的作者還提出一個口號：「發表是硬道理」，不管好不好，能發表就好。在這個口號之下，能將雜文寫成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學之文、文雅之文嗎？缺文的雜文有多少人要看？抄一段新聞，然後再說幾句套話（與官場套話略有區別），如此文章不難寫，有人一天能寫三、五篇，但要人家讀得下去就難了。這樣的書送給人，非但不能給自己加分，反而會讓人知道你原來寫的是這等文章。為自己着想，這樣的書還是不送人為好。當然，書已出了，卻要下決心不送人，有點難。

此外還有一小小的難處：給不給工作單位的領導送書？不管有文無文，雜文總要帶點刺的，儘管沒有明確刺向誰，但有些領導喜歡對號入座，某篇文章，某段文字就是諷刺他的，從此懷恨在心隨時找機會報復。不送給他吧，他又會認為你這是小瞧他，說他沒文化。領導幹部最不願的就是被人小瞧。送不送呢？送！誰想對號入座由他去吧。

我說送書難，並非是矯情。六年前我出了一本書，印數也不多，還有朋友幫忙，至今還沒送完。每當看到這些沒賣完的書，我就暗暗發誓：以後不再出書了。出書，每個環節都難。



人生在緣

近讀一篇短文，其立意是老年人以「懶一點」為好，有益於健康。仔細琢磨，覺得此文頗有道理，不僅深有同感，還很想講一點自己的感受和體會。

我已屆耄耋，家人近來正在忙着為我慶賀八十壽誕，即便按照時下的劃分，也應該被列入老年範疇。因此，雖然依然懷有童心，願意同年輕人交往，但常以老年人的心態思考和對待問題，大概不屬於「倚老賣老」。

我理解，「老年人以懶一點為好」，不是規勸老年人懶散，不是要老年人四體不動，整天發號施令，而是不要事必躬親，更不要爭強好勝。各種事情可以做一些，但務必要適量、適度、適力，這應該是老年人參與事情的個人尺度。

老年，與人生的其他年齡段大有不同，需要有一個體驗和認識的過程。人老了，腦子慢了，肢體不靈活了，體力也有限了，再像年輕人甚至中年人那樣行事肯定不行。「

老人「懶」點好

徐貽聰

力不從心」，是我越來越身臨其境的感覺和實際狀況，有些事情想去做，或者想搶在別人前面去做，但經常「身不由己」，難以如願。我的同輩人中，有人因搶着去開門而被絆倒摔傷，有的因拒絕年輕人的攙扶而自己磕倒在樓梯上，有的爭着去買菜卻空手而歸……結果可想而知。這種現實不承認是不行的，我們只能「安之若素」，坦然以對。自己「懶」一點，在許多事情中接受甚至請求年輕人施以援手，於老年人而言，絕不是什麼丟面子的事情，不僅完全在情理之中，而且是在減輕親人或者他人在精神上和肉體上的負擔，是對社會的一種無形、無聲的貢獻。我這樣說，應該完全不是胡吹亂侃。

根據統計，我們國家已經進入老年社會，也就是說，老年人在全國人口中佔有的比例越來越大。

老年人在人口比例中的上升，是今天人們健康水準提高的反映。老年人人口多了，引起社會關注的程度在增多，老年人對自己的關注程度也在提高。老年人和社會，需要雙向關注。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懶」一點，也就是動作少一點、慢一點，可以是老年人

給予社會的主動關注之一。

我還以為，老人在兒孫面前「懶」一點，是對他們的教育，是對他們的鼓勵。年輕人或者幼人在老人面前的勤快，主動或者被動地幫助老人做一些他們能做到的事情，是他們成長過程中的必修功課，有益於老人，更有益於他們自己。

所以，當我的子孫有意幫助我時，我的態度是默許，是鼓勵，是讚揚，而不是還以「我自己來」，儘管我自己真的也可以不太費力就能做到。在這一點上，我對我的第三代感到高興和滿意，因為他們在我的身邊時，無論是在家裏，還是在外面，經常表現出主動助人的精神，基本上不需要我自己動手做體力方面的事情。

順便說一句，老年人的「懶」和一些人給領導人的「抬轎子」，無論是在形式還是在內涵上，都完全是兩回事，千萬不要同日而語。

老年人需要活得愉快，活得充實，活得有意義，「懶散一點」與這個目的並不衝突，於自己無害，對社會還有益。這是我對「老人懶一點為好」的體會。

香港最珍貴的兩幅招牌字

鄭家豪



HK人與事

遊客踏上香港，其中最被吸引是密麻麻的招牌，一個連一個的公司招牌，華燈初上，九龍的彌敦道，港島的銅鑼灣，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火，耀眼奪目，就是巴黎、紐約，也未見這般輝煌，如夢如幻，如入迷宮，蔽日遮天的商業招牌，不由不說，繁華、迷人、一時令人失控！

招牌是次文化，是書法普及而用，以「招牌字」列為一格，說別人的字是「招牌字」，只是相對於書法家，要達至成家，還須磨煉。「招牌字」要大眾化，要筆畫工整，要人人看得懂，龍飛鳳舞不是東主所要的字體。

琳琅滿目的招牌，卻藏着精品，一些書畫名家手書的招牌，視為市中街頭藝術供諸觀賞，在商品群中提升都會氣質。歲月沖刷，市內重建，名家書寫的招牌一併拆掉，留下不多。只能在招牌的汪洋大海中細心找尋，偶有驚喜發現。

尚能發現的有于右任寫的「泉章居」，寫得特別好，我以為是于右任草書中的精品，「泉章居」經營數十年，期間一些名氣酒家逐漸消失，「泉章居」屬長壽酒家，如今仍健在，于右任的佳作因而得到保存。灣仔大有商場對面一幢商住大廈，有兩家宗親會會所，招牌也出於于右任手筆，大抵應對方要求而寫，屬應酬之作，遜於「泉章居」，但仍是難得一見的好招牌。于右任為國民黨第一代元老，擅行草，乃著名書法家，被推

崇為近代行草的代表，近年他的書法作品經常在一級拍賣行出現，為藏家追捧，價值數萬元至數十萬元。

國畫大師齊白石甚少為他人寫招牌，其中一幅卻落在香港。畫家陳海鷹創立「香港美術專科學校」，其志為香港培育美術人才，著名畫家江啓明、陳球安、劉家義等皆出自香港美專。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陳海鷹到北京拜會白石老人，懇請題字，老人欣然答應，題寫「香港美術專科學校」，現懸掛於彌敦道近樂坊對面的校址，乘車或路過可見。齊白石的書畫，在拍賣場上氣吞牛斗，動輒百萬至幾千萬元，一字難得，字字千金。白石老人與于右任的「香港美術專科學校」及「泉章居」，是我所見的全港最具價值的招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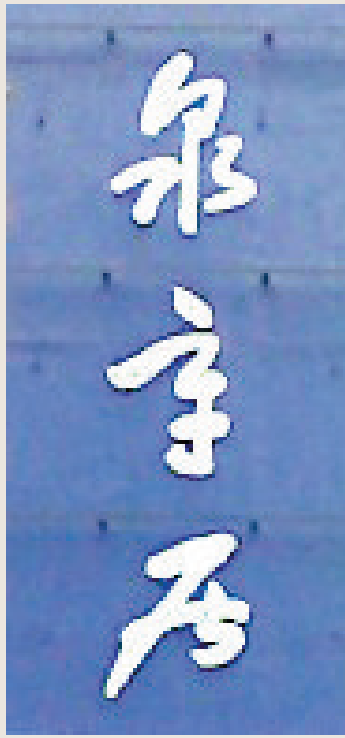
再下來不能不提一個人——書法家區建公。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區體招牌盛行，區建公寫得一手北魏體，區體其實就是北魏體。北魏字體剛勁挺拔，氣勢萬鈞，商人崇尚活力魄力，喜歡他的字體，不約而同請他寫招牌，南北行的參茸商號、五金店、商會、同鄉會、藥房、麵包舖、新建大廈都找他寫招牌字，還有寫匾額的，寫碑文的都找他，此一時期，區建公的招牌字舉目可見，遂有「招牌王」之稱。後來官方也找他，港府一九六二年五月四日發行「香港郵票百周年紀念」紀念郵票，及首日封的書法大字，同出區建公手筆。

區建公，新會人，早年居澳門，一九一二年創辦德華學校，後轉居香港，一九三〇年辦「香港區建公書法學院」，他是書畫家

，與黃般若、李凡夫常來往，現可看到的「奇華餅家」的招牌字由他書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每年舉辦「區建公紀念書法比賽」。

書法家謝熙也寫過一些招牌，數量不多，自成一體更不容易，他的作品偶然在一些普及拍賣行出現。

時下的招牌字，趨向電腦字體、美術體或日式字體，與時俱進，欠了人性化的一面，看不到名家手筆，遺憾了！



▲于右任寫的「泉章居」

作者供圖



▲「香港美術專科學校」為齊白石所書

作者供圖

魯迅與朱安的無奈和悲哀

魯人



人與事

朱安是魯迅的原配夫人，更是魯迅的母親魯瑞送給他的「一件禮物」，他們的婚姻從一開始就形同虛設。

朱安是魯迅一位叔祖母的親戚，比魯迅大三歲，身材瘦小，相貌普通。但她性格安穩、溫順，恪守舊時禮數，讓性格頗開朗的魯瑞很有好感，以至自作主張地為魯迅定了這門親事。魯迅知道之後，一再表示拒絕，多次提出退婚要求，這讓魯瑞很尷尬很為難。依當時紹興的習俗，退婚對女方是很大的侮辱，甚至會讓女方的家庭都蒙受羞辱。為此，魯瑞只好請一位與魯迅關係頗密切的族叔給正留學日本的兒子去信規勸。魯迅的回信說：「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兩個條件：「一要放足，二要進學堂。」」朱安的答覆則是：「腳已放不大了，婦女讀書不好，進學堂更不願意。」魯迅的開放與朱安的守舊，加之二人性格的固執，注定了他們日後的不幸。

一九〇六年，二十八歲的朱安已超過當地「養女不過二十六」習俗的極限。此時，又有傳言，說魯迅已在日本與一個當地女子結婚，並有了孩子。朱家不停的逼婚，魯瑞只好請人連續打電報、寫信，說母親重病，催促魯迅盡快回國。魯迅趕回家後發現母親並未生病，家裏卻張燈結綵，讓他很錯愕。魯迅的三弟周建人回憶：「只見母親與他單獨談了很久。在長輩們的「勸說」下，魯迅屈從了。洞房之夜，魯迅是如何度過的不得而知。但據他家的一位傭工回憶：第二天早晨，見魯迅神情黯然，臉上還有幾塊靛青色，猜測是淚水打濕土布被子染到臉上的。第二天夜，魯迅住到了樓下自己的書房；第四天便返回了日本。」

以後，魯迅不論是回浙江任教，還是全家搬往北京，與朱安都是分室而居。兩個思想、性格、志趣截然不同的人，被命運綁在一起，又處於一個被禮教束縛的時代，他們的命運可想而知。

朱安一直在努力，希望得到魯迅的認可。日常事宜皆聽魯迅安排，魯迅生病時她會悉心照顧，對婆婆的照顧更無可挑剔。魯迅也曾嘗試過改善

二人的關係，朱安的言行卻讓魯迅難以接受，許多生活的細節更讓他尷尬又無奈。一個盛夏，一名學生登門拜訪。天氣酷熱，朱安卻先給魯迅和客人敬上兩杯熱茶，之後又送上兩碗熱騰騰的藕粉當點心。對她的好意，魯迅只好對學生苦笑說道：「既然拿來了，就吃吧，無非是再出一身汗。」這件事讓這位學生到晚年時還記憶深刻。又一次，魯迅跟朱安說日本有一種食品很好吃，朱安立刻附和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其實這種食品，不但紹興沒有，中國都沒有。之後，魯迅越來越不願與她交流。

他們的交流越來越少，為了少說話，漸漸還培養出許多默契。住北京西三條二十一號時，魯迅房裏的床下放著一個柳條箱，裏面放著魯迅換下來的髒衣服；朱安的房門口則放了柳條箱的蓋，放著朱安洗乾淨的衣服，蓋上罩了一張白布單，使初次來訪的客人不明就裏。朱安有意無意地用婚姻將自己與魯迅綁在一起，她以為只要自己全心全意地「服侍」好魯迅，總能得到所願的回報。豈不知，從她拒絕放足識字，她之所願已毫無希望。而她「服侍」得再好，只能讓魯迅感到無奈、不安，甚至厭煩。魯迅能給她的除了物質上的「供養」，剩下的只有同情，甚至憐憫。而這種捆绑則成了魯迅和許廣平的愛情無法越過的障礙。在魯迅和許廣平的愛情中，起初，魯迅一直處於被動，很重要的原因應該是願忌到朱安。魯迅最反對的是男人娶妾，他以「叫出沒有愛的悲哀，叫出無所可愛的悲哀」來控訴封建禮教，以「要叫到舊帳勾銷的時候」表示鬥爭的決心。但面對現實，他卻要與那些難以掙脫桎梏的婦女「陪著一世的犧牲者」。如此自然無法給所愛之人一個堂堂正正的名分，因此，魯迅覺得自己不配也不敢去接受愛情。好在許廣平無所顧忌地衝破一切禁錮，給魯迅的生活帶來了溫暖的陽光。魯迅的年輕朋友川島回憶一九二八年上海見到魯迅的情景時說：「我對他有一種新鮮的感覺；臉上氣色很好，不像以前那麼沉鬱而帶著蒼白了；人也似乎胖了一些；身上的衣着也比以前整潔得多。」但朱安的存在讓魯迅不管走到哪，內心也無法真正完全平靜。

（上）

郵輪旅遊之熱

言青



自由談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老百姓又掀起郵輪旅遊熱。前幾年，我們去東南亞，去俄羅斯，去歐洲，飛機上坐滿了中國的旅遊者，那時正是中國人乘飛機滿世界遊的時候。後來聽一些朋友說他們要乘郵輪去地中海，我們感到很新鮮。今年，我的小妹（我先生的小妹）發起郵輪之旅，我和先生都沒乘過海上見的大型郵輪，我們毫不猶疑地回應了她的號召。不過我們年紀大了，還是選一條近近的線路為好，於是我們跟兩個妹妹家一起於六月十日登上了近十一萬噸的郵輪，赴日本長崎和韓國濟州島。

其實，我們兩人的目的不是去看長崎和濟州島，這兩個地方以前因為工作關係已經去過多次，我們的目的是去體驗郵輪生活。但是當我們登船之後，使我們震撼的除了郵輪生活本身，就是郵輪上的人們了。和我們一起登船的近三千名旅遊者全部是中國人，他們扶老攜幼，有的年輕人攙着年邁的父母，有的背着幼小的嬰兒，有的老夫婦互相攙扶着，有的可能是新婚夫婦，手拉着手，

滿臉興奮……

我們看見一對年輕夫婦，媽媽胸前揹着一個兩、三個月的嬰兒，我們問她：「這麼小的孩子，免票了吧？」她一臉否定地說：「一個腦袋一張票，一分錢都不能少。」我說：「他這麼小，還沒有記憶，給他花六、七千塊錢來玩兒，值嗎？」他們說：「值，他出了家門，兩個眼睛能看不到不一樣的環境。」我長出了一口氣，心想，你們還是有錢呀。

一天早晨，剛剛醒來，聽到廣播裏說，今天五樓珠寶店贈送每位旅客一枚藍色小寶石，如再自付十美元，還可獲得一對藍寶石耳環。

早餐後，到五樓一看，我驚呆了，領寶石的隊伍已從珠寶店門口排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我出於好奇心，想找找隊尾在哪裏，走了好長的路，一位老太太叫住了我，問我是不是在找隊尾，她說她就是最後一個了，讓我站進來，我猶猶疑疑，她拉住我說：「老大姐，快進來，隊伍走得慢，上了船什麼活動都要參加，這就叫參與，其實我家的寶石比這大多了，這不是自己找樂兒嗎！」她說的有道理，就這樣，大家說說笑笑，終

於走到了珠寶店。

我們到十七樓甲板上休息，站在圍欄旁眺望無垠的大海，許多孩子在大人の帶領下正在游泳池裏嬉戲。這時走過來兩位老太太，農村老人打扮，經問，方知她們從遼寧來，原來她們是親家。一位老人說：「我們是跟我女兒來的，四個女兒家十幾口子人都來了，這不，把我們兩個也帶來了，他們年輕人都在五樓廣場跳舞呢。」她的親家插話說：「我們一輩子沒坐過這樣大的船，老了老了，又來享受來了。」我說：「現在人們都生活好了，該享受享受啦！」

是啊，滿船的人都是中國普通的老百姓，不是我小時候在電影裏看到大輪船上那些貴族富豪的太太小姐們。

據一則報道稱，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時任美國總統的卡特在與鄧小平會晤時曾抱怨中國的旅遊自由度不夠，鄧小平問道：「您準備好迎接一千萬中國人了嗎？」

鄧小平當時預言的一千萬，眼下已變成了上億人。據專家估計，到二〇二〇年，這一數字可能會翻一番，達到兩億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財富增多而負擔得起海外度假的旅遊者。